

枣庄历史通讯

(一九八六年三月)

枣 庄 市 社 会 科 学 联 合 会 编

目 录

一、枣庄市历史学会第一次换届会议简况·····	2
二、于春海同志讲话稿·····	3
三、学会工作意见·····	6
四、学会章程·····	8
五、枣庄地区文物考古概述·····	9
六、卓越的政治家诸葛亮·····	14
七、对“国共军调部第二十八行小组” 枣庄 庄工作情况的探讨	17
八、孔子思想源流初探·····	20
九、地方志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23

枣庄市历史学会

第一次换届会议简况

枣庄市历史学会第一次换届会议，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市电影公司举行。五区一县、矿务局和市直各大单位的会员代表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枣庄日报社派代表应邀列席会议。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张守德、王东民同志到会做指导。市委宣传部长于春海付部长到会讲话表示祝贺，并对学会工作提出要求。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凌云同志特邀参加会议，作“关于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专场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朱余庆同志代表上届理事会作工作总结，肯定了我市历史学会创建三年来取得的成绩，并对新的理事会进一步搞好学会工作提出诚恳的意见。颜承华同志传达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山东省历史学会泰安会议精神，对《枣庄市历史学会章程》（修订稿）作了说明。崔本廷同志代表新理事会作工作报告，提请会议讨论通过。

会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本着群众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原则，考虑我市广大历史工作者大都从事教学工作这一特点，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会。（见附表）

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市文馆站李锦山同志，枣庄师专王先仁同志，市委党史办公室郭明泉同志，滕县师范学校李士新同志，枣庄市第一中学聂敦本同志，滕县商业局张维斌同志就枣庄地区的文物考古、古滕国、孔子、诸葛亮、军调部在枣庄的谈判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

到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我市历史学会创建以来的一次盛会。本届会议民主气氛好、学术空气浓，反映了我市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研究新的面貌，检阅了我市历史研究的部分成果，必将有力地推动今后学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接第13页

- ③ 枣庄市文物管理站：《枣庄市南部地区考古调查纪要》，《考古》84年第4期。
-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 ⑤ 李锦山、文光：《从出土文物看汉代枣庄地区的农业》，《农业考古》84年第1期。
- ⑥ 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汉画像石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 ⑦ 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枣庄市历史学会

第二届理事会名单

名誉理事长：侯克新、朱余庆

理 事 长：崔本廷

副 理 事 长：赵文林、颜承华

秘 书 长：颜承华

副 秘 书 长：郭朝刚

常 务 理 事：崔本廷、赵文林、颜承华、贺荣第、郭朝刚、李锦山、张迪

理 事：崔本廷、赵文林、颜承华、贺荣第、郭朝刚、李锦山、王仙仁、孙龙、
李效其、王世荣、聂敦本、万树瀛、裴永亮、张迪、刘以德

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社联主席于春海同志在枣庄市 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枣庄市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今天召开了。这是我市史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对开创我市历史科学研究的新局面，推动我市的学术交流和历史课教学，使史学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代表市委宣传部和市社联向大会表示热烈地祝贺！

最近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光荣任务，通过了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建议，重新强调了坚持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中央提出的这些任务和方针中，都包括社会科学工作，当然也包括我们史学。历史科学既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又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单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的要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人们树立起崇高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思想情操、工作作风和生活准则；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要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历史科学和史学工作者，负有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天开会，来加强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普及，就是要更好地为实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那么，我们的历史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一）历史是我们民族自信力的源泉

我们中国人一向是重视历史的、在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官修的史书，地方史志以及大量民间编纂的史籍，（被称为野史）。这些史书、史料世代相传，使得我们中国人得以从过去的历史中知道过去，预见未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用来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历史或忘记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发展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成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个历史发展过程，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就不能割断历史。

世界上几个文化发展较早的古国，只有我国是从古到今一直延续下来的，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没有间断过。我们中华民族曾多次遭受过苦难的历程和严峻的考验，但每次都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又顽强地进取。在我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短暂的分裂，但在每次分裂之后，又总是在新的基础上统一了。因此，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我们总是保持着大一统的昌盛局面。这是民族的光荣，我们的骄傲，是任何民族、国家不能相匹敌的。所以，了解我们的历史，可以更热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增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力量。

（二）历史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动力

我们祖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英勇壮烈的爱国主义的战斗史诗。我们的祖先千辛万苦，开辟了这块辽阔广大而又富饶美丽的国土，使中华民族世代生活、繁衍在这里，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养成了一种极其深厚的胞泽之谊。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凝结着我们先祖的辛劳和智慧。爱护她、保护她，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叛卖，中国沦于被压迫、被凌辱的境地。然而，中华儿女在这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所吓倒，没有被帝国主义的烧杀掠夺所征服。相反，它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团结一心，勇敢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革命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

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前赴后继，不断地进行着英勇壮烈地斗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民族英雄气概，就是任何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并且永远也不能吞灭中国的根本之所在。

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可以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知道先辈创业之艰难，保持和发展胜利成果之不易，从而加深人们的责任感，激发起人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忱，提高人民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责任心。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用爱国主义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是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支柱。

（三）历史是一面镜子，对当前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而且进步的越来越快，就是因为人类善于利用自己几千年的发展史，懂得在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这个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史。因为历史记载了前人的得失，可以作为后人的一面镜子，使人们少走弯路，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反杜林论》“自由和必然”一章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他说，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现代又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这里的“解放”是指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认识和支配自然），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类同动物界分开。所以，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发展和进步，都不能离开历史，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起来的。

历史，是了解并掌握、解决现实社会的一把钥匙。当前的问题，总有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只有从根本上看清它，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作指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历史和现状的具体分析、认识，要取得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就是因为党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记取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才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近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形成的历史文献，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的继续和发展，它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今天到会的诸位同志，有的是从事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多年的，也有的是新近加入学会的。也就是说，我们既有积累了多年研究和教学经验的同志，他们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成绩，起着带头作用；又有一批精力充沛敢于创新的年轻同志。这对于开展学会的今后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希望新老会员团结互助，取长补短，为发展我市的历史科学而共同奋斗。这里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具体希望和要求：

（一）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枣庄地区在古代和近代史上都有着丰

富的历史内容，需要我们去发掘、去探索。如在滕县发现的属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北辛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出土文物，古薛国、古滕国的历史等，都有待于做出进一步的研究。近代中国革命史，有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驰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淮海战役以及鲁南人民的武装革命斗争，也有待于整理、研究，以流传后世，丰富祖国的历史宝库。希望全体历史学会会员不辜负全市人民的重托，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紧紧围绕枣庄实际，从枣庄的历史和现实需要出发，以更大的热情和干劲去工作，开展各方面的史学研究活动，用你们的出色劳动来发扬光大我们枣庄地区的发展史。

理论研究要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四不”主义，努力活跃我们的史学论坛。

（二）进一步促进我市中小学历史课的教学、教研工作。我们历史学会，不仅要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和交流等活动，而且要通过学会的学术活动，推动社会的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纪律教育，推动促进学校的历史课教学，进一步提高我市历史课的教学水平。

（三）史学要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我们搞史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古为今用的方针，既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更要注意发展应用史学的研究，紧紧围绕着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开展史学研究，搜集新史料，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枣庄市历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在任期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二届理事会将通过大会选举产生。希望第二届理事会再接再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胜利，在历史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最后，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谢谢。

枣庄市历史学会工作意见

（1985、12、25日通过）

枣庄市历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订了学会工作意见，请与会同志讨论、通过。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史学工作者，史学教育工作者，以及史学爱好者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全国改革的新形势，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和历史教学方面的问题，才能使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沿着正确地道路前进，出现勃勃生机。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唯书”、“唯上”的不良倾向，在实践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的影响，因而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当前，我们要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不断提高自己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打破思想禁锢，端正史学研究的业务指导思想，在更广泛领域里深入开展史学研究和探讨，使我们市的历史研究工作开出灿烂的花朵。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才能使许多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史学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历史研究获得新的成果和长足地前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努力掌握各种科学知识，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掌握多种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一定会有利于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二、根据实际情况，搞好学会的组织工作。

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建立分会或学组，已经建立分会或学组的，这次会议之后要进行必要的整顿。分会或学组根据会员的多少和兴趣建立若干研究小组，有计划地开展专题研究。各分组或学组要在各区、县宣传部的领导下，努力搞好史学研究，争取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

要经常注意我市历史学界涌现出来的人才，及时发展他们加入历史学会，使史学研究队伍不断增添新鲜血液。

三、努力搞好学术研究，及时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史学研究工作，要坚持史学研究为政治服务，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为教学服务的原则。每个史学者和史学教育工作者都要努力完成自己的科研计划，撰写论文。要把重点放在地方史的研究上，枣庄市地区是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代文化遗址较多。历史资料丰富，我们必须认真发掘，分类排队，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进行专题研究。例如：古代史的古薛国、滕国、峄国；近代史中的台儿庄战役，鲁南人民的革命斗争，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等等。这些史学课题，给我市的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要分成专题，组织人员，分工协作，深入研究，撰写论文，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研究成果，为我们枣庄市的历史研究工作开创新局面，为下一步的史学研究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争取三年内出一部枣庄史学研究的专著。

枣庄市历史学会计划每年搞二次大的学术活动，上半年搞一次学术报告，下半年进行一次学术讨论，在适当时候组织必要的参观和历史考察。

每年搞一次优秀论文和优秀学会工作者评奖活动，被评为优秀论文和优秀学会工作者的要颁发奖状和奖金。学会要求每个会员每年至少要撰写一篇论文，三年没有论文者，按自动离会处理。一九八六年的评奖活动，要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

四、搞好历史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史学会的会员有一半以上是历史教育工作者。这些同志应该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掌握历史教学规律，不断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努力赶超省内外历史教学的先进水平。

五、办好会刊，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恢复历史学会会刊，为不定期内部刊物。努力办好会刊，加强信息交流，要及时把优秀学术论文向省历史学会和全国性学术刊物推荐。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枣庄市历史学会章程(修改稿)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通过)

一、名称：本会定名为枣庄市历史学会，是山东省历史学会的集体会员单位，是市社联的下属组织。

二、性质：枣庄市历史学会是本市专业历史工作者、历史教育工作者和业余史学爱好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三、宗旨：本会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开展历史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活动，把史学研究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激励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加快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步伐，多做贡献。

四、会员：凡本市专业史学工作者或业余史学爱好者，赞成本会宗旨，愿意遵守本会章程，由本人申请，经本会会员介绍、本会常务理事会批准，均可为本会会员。

各种有关史学研究组织，经登记为本会集体会员。

五、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1. 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
2. 阅读本会有关的文件、图书和资料。
3. 对本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4.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遵守本会章程和服从本会决议。
6. 服从本会分配的工作。
7. 发展会员。

六、组织：

1. 本会最高组织为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必要时经理事会议决，得临时召集之。其任务如下：

- (1)、讨论和确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 (2)、讨论、审查本会工作报告。
- (3)、通过与修改本会章程。
- (4)、选举本会理事会。

2. 理事会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会务领导工作，由理事会担任。理事会的任期为三年，可以连选连任，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

次，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理事会的任务如下：

(1)、执行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

(2)、组织各种学术活动，编辑出版会刊，搞好史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3)、组织和推动各种有关单位的协作。

(4)、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并负责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5)、制订学会工作计划。

3. 理事会推选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若干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常务理事若干人，组成常务理事会，主持日常会务工作。

4. 区、县可设分会或者学组，各分会在业务上同本会发生联系。

5. 在会员比较集中的高等院校或机关，根据情况和工作需要，可设分会。

七、本会经费由市政府拨款并争取有关单位的资助。

八、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由本会理事会议修改执行，并经下次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追认之。

枣庄地区文物考古概述

李锦山

枣庄市地处黄河下游的东部沿海地带，从地质地貌上看，北部山峦叠嶂，峰回路转。西北为冲积平原，壤土较厚；南部由丘陵渐为原隰。从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角度看，这里适合古代人类的生息繁衍，属于“海岱历史文化区”。解放以来，我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过五次田野考古调查，发现各类文化遗址、遗存340多处，这些古遗址遗存从时代上分，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时代直至明清，从种类上划分，有古遗址，古城址，古瓷窑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革命文物。其中，有四处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四处是滕国故城，薛国故城，邳阳故城，岗上遗址。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8处，这18处分别是：桥上古墓、晒枣城遗址、娘娘坟、二疏城遗址、匡衡墓、陈刘耀遗址、梁王城遗址、曹沃古墓、南常故城、中陈郝瓷窑遗址、坎陵桥遗址、前掌大遗址、庄里西遗址、北辛遗址、孟家庄遗址、北台上遗址、龙泉塔、薛山农民抗日训练班遗址。下面，我们将依据历史发展顺序进行概括性的介绍。

史前遗址

在史前时期，我市曾是原始三大部族之一——东夷部族的活动区域。《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说文》：“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考古调查证明，枣庄地区已发现史前遗址90处，全部属于新石器时代。山东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①。这四种原始文

化，在枣庄地区均有分布。

北辛文化 以北辛遗址命名，位于滕县官桥镇北辛村，1978年秋和1979年春，由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博物馆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发现的遗迹有窑穴和瓮棺葬。陶器均为手制，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堆纹、篦纹、划纹等，主要器型有鼎、釜、罐、钵、碗、盆、壶、支座等。石器主要用砂质灰岩制成，有打制和磨制两种，器形有斧、敲砸器、盘状器、铲、刀等。磨盘有呈三角形、长方形和带矮足之别，磨棒横断面呈半圆形和圆角长方形的为多。骨、角、牙器发现数量较多，器形有镞、鱼镖、鹿角锄、凿、匕、梭形器、针、锥、铗等。北辛遗址堆积层厚达1.5米以上，说明当地居民在这里已生活相当长时间。从出土的大量骨石器看，已经进入了以锄耕为主的原始农业阶段。还饲养猪等家畜。狩猎和采集经济仍较为发达。出土的碳化粟粒和人工饲养的猪头骨，证明了北辛居民已过着比较安定的定居生活。碳十四共测定有七个数据，H501(2k632)为距今 7345 ± 215 年(校正值)。大体说，北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年——6300年左右，大约经历1千年的历史②。这次发掘，确立了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把鲁中南和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继北辛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文化。一九五九年因发掘泰安大汶口一处史前遗址而命名。这类遗存日前在我市分布三十六处。比较重要的遗址有红土埠遗址，南滩子遗址，沙沟五村遗址，岗上遗址，坎陵桥址等。这些遗址在文化内涵上归属于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类型。从已发现的墓葬看，氏族成员均埋于公共墓地，大都头东脚西，以仰身直肢为主。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牙器等。石器均为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锛、石铲、石镰等。采用磨制技术，穿孔较为普遍。陶器分夹砂、泥质和少量硬质白陶，陶色以红色为主，纹饰主要有蓝纹、绳纹、镂孔、堆纹、刻划纹、窝点纹，主要器形有鼎、罐、钵、碗、豆、尊形器、瓮、缸、盆、壶等，并发现少量彩陶，主要是红彩或黑彩。骨器主要有骨锥、角器、骨鱼镖等，如红土埠遗址一座残墓中出土骨锥29枝之多③。在滕县，出土一件象牙雕筒残片④。玉器有玉环、玉饰件等，如岗上遗址出土的一件人面形玉雕，在我国史前遗址中尚属少见。红土埠遗址出土有绿松石耳坠。枣庄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相当于兖州王因遗址的时代到曲阜西夏侯遗址的晚期，也就是说，这类遗存在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400年前后，经历了190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这个时期，在婚姻上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发层的时期，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私有制已经产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在原始宗教习俗上流行凿齿、手握獠牙、随葬猪头骨现象，并以太阳为图腾，崇祀社石地母，有文身习俗。这一时期还萌发了原始礼制观念，在随葬品中出现了陶礼器。

龙山文化 1928年因发掘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命名，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在考古学上又称作典型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原始文化。枣庄地区共分布龙山文化遗存50处，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晒末城遗址、二疏城遗址、庄里西遗址等。常见器物有石器、陶器、骨器、此外还有玉器、蚌器等。石器均为生产工具，如斧、锛、刀、镰等。玉器有礼器玉璇玑。陶器分夹砂陶、泥质陶、细泥陶和硬质白陶，以黑灰陶最多，有的磨光发亮。纹饰主要有竹节纹、绳纹、蓝纹、附加堆

纹、弦纹、划纹、方格纹、几何形压纹和镂孔。常见器物有鼎、鬲、甗、罐、瓮、盆、盘、碗、钵、杯等。尤其是蛋壳黑陶，厚度不及一毫米。骨器主要有鹿角器、骨镞、骨器柄等。从文化内涵看，枣庄的龙山文化遗存接近城子崖类型。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早期，时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晚期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枣庄龙山文化遗存的年代不会超出这个时限，经历了约600年的发展历史。龙山时期的农业比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了较大发展，手工业技术更为明显。尤其是制陶业，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器物造型精美。这个时期，正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相当于军事民主阶段。

岳石文化 因发掘平度东岳石村一处遗址而得名。其时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前后，后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相当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夏文化。其文化特征是陶器以夹砂褐陶（或夹云母、滑石末）和泥质黑皮灰胎陶为主，器壁均较龙山文化的陶器厚重，纹饰亦有变化，器物造型不同于龙山时期。这一时期已出现了铜器。这种文化遗存目前在枣庄已发现了三处，限于资料，姑且从略。

枣庄地区的史前遗址大都分布在薛河、濰水、荆河、北沙河、涛沟河、峄城大沙河、蟠龙河等流域，尤以薛河为集中，是古代人类的居落中心。这些遗址，大都呈台形或墩子形，位于古河床两岸的高地上，每个遗址，往往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堆积。

二、夏商周时期

夏朝 目前，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工作正在豫西晋南地区进行，两且有了突破。但在山东乃至枣庄地区，是否有夏文化存在？何种遗存属于夏文化？迄今仍是待解之谜。

商代遗址，全市共分布31处，比较重要的有前掌大遗址、后荆沟遗址、大韩遗址、邢店遗址等，出土文物有陶器、铜器、石器、骨器等。陶以灰陶为主，分夹砂泥质两种，火候高，常见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网状划纹等，主要器形有鬲、豆、殷、尊、缸、瓮、盆等，不见或少见鼎。青铜器有车马器，有礼器。如金在墓葬出土的铜鼎，铭文有“緡（咏音，人名）作父庚彝”五字，腹部饰有云雷纹和夔纹。大韩遗址出土的铜爵，腹部有族徽符号。198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滕县前掌大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器物有铜器、玉器、陶器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资料。从枣庄地区的商代遗存看，既有先商的遗物，又有早商的遗存，但大多相当于郑州二里岗时期和安阳殷墟时期。从历史文献看，枣庄南部紧邻商代万国大彭，北部靠近奄国，东北部莒国，而薛故城一带又曾有仲虺居住。上述遗存，可能与这些族系的活动有关。

两周遗址，西周和东周遗存全市共分布150处，出土文物有陶器、铜器、石器、玉器等陶器的种类及器形在商代的基础上有所变异。铜器出土的有礼器、兵器、车马器。如铭文铜器“薛子仲安簠”、“滕公鬲”、“王子安铸寝戈”等。此外还有大量青铜剑、铜矛、铜戈、铜镞出土。战国货币如楚贝币、齐刀币均有出土。铜乐器有“滕皇编钟”以及石编磬。属于两周时期的故城有薛、滕、邶阳、小邾、常（尝）等。

薛国故城 位于滕县南十七公里薛河北岸。薛建国甚早，在周初封建前已存在，《通志·氏族》云：“薛氏，任姓，黄帝之孙，颡帝少子阳封于此，故以为姓。”自阳传及奚仲凡十二世。《左传》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西周初“复国于薛，爵为侯”。周显王二十九年（前三四〇年）一度迁于邳，周显王四十六年，为齐

所灭。战国初，齐威王少子田婴就封于薛，号靖郭君。其后，婴子田文（孟尝君）继封于此，“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现存城墙周长一万零六百一十五米，残高四—七米，底部宽约二十至三十米，为战国早期筑建，其后经过几次改筑或修筑。

滕国故城 位于滕县西南约七公里处。早在殷商之时已是方国，西周初年，武王克商后封异母弟叔绣于此，爵为侯。《左传》载·其疆域“决长补短方五十里”。滕君传位三十一世，历七百余年，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为宋国所灭。滕城有郭城和官城二重，外城周长二十里，内城周长约四里，现仍高出地面三—四米，城基宽处可达十米之多。

邶阳故城 位于台儿庄区洞头镇西约五里处，周之前，邶阳即已有之，与殷时方国大彭有亲属关系。国君妘姓，周时封为子爵。《春秋·襄公》载：“襄公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齐世子光会于柵。夏五月甲午，遂灭邶阳”邶阳“中据土山，外建久门”。故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3293米。

尝邑 又作常邑，位于薛城区南常乡北，春秋时为鲁国边鄙之邑。《诗经·鲁颂》云：“眉寿保鲁，居常与许”。战国时被略为楚地。现此城残垣犹存，东北角为瓮城，暴露大量东周遗物。城墙平面呈方形，北高南低。采用穿绳夹棍板筑法筑建，夯窝呈圆角方形，直径约四—五厘米。此城《峰县志》误作“建陵城”。

小邾 春秋时国名，曹姓，开国君主是陈文公之子曹友（一说名肥）小邾又作“倪”“倪儿”，其地方一说在滕县东，一说在今山亭区西集附近，目前在考古上仅限于田野调查，有待于以后澄清。

秦 汉 时 期

秦朝时代很短，反映在物质文化上的特征，未发生质的变化，所出器物，既具有战国晚期的特点，又与西汉初年比较一致。在秦都附近，发现有大量的秦代墓葬，建筑遗址，器物断代较为容易。枣庄距秦都较远，作为上层建筑的丧习风俗不可能在经济基础改变之后很快发生质和量的变异。因此，在未发现一定数量的属于秦代的建筑，墓葬及标准器的条件下，很难作出遽断。不过，属于秦代的文物倒是发现了寥寥几件。

汉代 汉代是一个灿烂的历史文化时代。两汉时期，枣庄大部分土地属于东海郡，这里不仅距汉代皇室的故乡甚近，距儒学的发祥地孔孟之乡也不远，有着深厚的物资文化及精神文化基础。《汉书》说：“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大学者刘向说：“兰陵多学”。因此，反映在精神文化上，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著书立说，讲经课徒，传播儒家经典。反映在物质文化上，农业、手工业较为发达。根据枣庄地区的考古资料，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农业、牛耕较为普遍，铁农具广泛应用，翻土已使用了大型犁铧。水利较为发达，井灌或渠灌均具一定规模，以多种经营为经济特色地主庄园分布不少，有了一套由贮藏到加工的工艺技术，蚕桑和纺织业较为发达，家禽家畜饲养比较普遍⑤。如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牛耕、马耕图，纺织图。出土的铁农具有犁、铧、犁铧、锄、铲、耧等。隋墓的陶器中常见井、仓灶猪圈或猪。

手工业、冶铁业发达,并发现冶铁遗址五处,皇殿岗遗址出土标有“山阳二”作坊官记的陶范。铁器中以农具为主,此外有兵器如环首刀、剑、戟。宏道院出土一块“冶炼画像石”,反映了手工作坊工人用皮囊鼓风冶铁,煅打铁器的场面。铜器主要有生活用具、兵器。铜镜工艺水平较高,装饰富于变化,部分铜镜铸有铭文。

枣庄的汉代遗址十分丰富,古城址主要有阳平故城、莒城故城、承县故城、新阳故城等。汉墓遍及各地,其中汉墓群多达30多处。墓葬种类有砖室和石室两种,尤以石室墓形制多样。计有石槨墓、双室或多室墓、前堂后室墓、叠涩墓、带回廊大墓等。随葬品较为丰富,多成组成对。西汉时器物组合多为鼎、壶、罐,东汉以仓灶猪圈磨为多见,反映了当时的厚葬之风十分盛行。如渴口汉墓群发掘了一百多座墓葬,出土文物千余件,为研究汉代的葬俗和家族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是汉画像石,十分丰富。目前全市已收集300余块,内容有车马出行,神话传说,使乐百戏,异禽奇兽、历史故事等。是研究汉代艺术史、文化史以及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其雕刻技法以弧面浅浮雕为主,此外还有阳线刻,平面雕等⑥。

汉以后各时期

汉以后各时期的遗址,发现较少,资料较零碎。出土文化物虽然不少,但不系统,如南北朝时期的铜镜铜佛造像,历代石刻、生活器皿均有出土。古建筑方面,有宋代龙泉塔。清代王家祠堂、明代普照寺,但规模较少,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古瓷窑遗址。全市共发现古瓷窑遗址十四处,大都分布在钩台山南麓,呈东面向分布,就其规模,尤以中陈郝瓷窑址为大。现在已出土一百多件古瓷器。主要有青瓷、白瓷、白釉黑花,黑瓷等。《大明一统志》载:“兖州府土产黑瓷器,峄县出”。《峄县志》载:“齐村、许池诸岭所产青垆白垆,质坚性粘,做什器尤良,……元时钩台居民业陶者甚多,作冶什器贾数千里,获利犹厚。”《峄县志》的记载把枣庄烧造瓷器的历史缩短了一千年。根据考古资料,早在南北朝时,枣庄就兴起了烧瓷业。从隋至唐,是青器的兴旺时期,器物造型朴实稳重。五代至北宋,所产白瓷以生活用为主,讲究实用。北宋时出现了白釉褐花装饰。自金代中期起,峄州窑瓷器受磁州窑风格影响,以白釉黑花为主,延续到元代。至明清,风格为之一变,黑瓷后来居上。枣庄瓷窑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北方瓷窑分布及山东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新资料⑦。

综上所述,枣庄历史悠久,地下文物丰富,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新的文物会不断发展,必将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史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1986年春节前夕于枣庄

注 释

①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第10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卓越的政治家诸葛亮

枣庄一中 聂敦本

由于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影响，诸葛亮的故事，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读过《隆中对》和《出师表》的人，无不赞叹诸葛亮的政治远见和对蜀汉的一片忠心。他所提出的“联吴抗曹”的策略，表现了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政治远见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西蜀人民。他志在攻魏以复中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乱时期人民的某些愿望，符合当时社会统一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一、“隆中对”，表现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远见，为处于劣势的刘备，指明了取得胜利的道路。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少孤，随叔父诸葛玄避乱荆州。玄卒后，亮隐居隆中（山名，在湖北襄阳县西。）

当时（公元201年），刘备奉袁绍令攻打汝南，袭扰曹操后方，被曹操打败，转投荆州牧刘表。刘表虽“以上宾礼待之”，让刘备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暗地却疑忌戒备（《三国志》《蜀志·先主备》）。刘备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多方寻求人才。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在当地名士徐庶的推荐下，“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在和刘备初见面时，就向他提出了占据荆、益，“联吴抗曹”的战略建议，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指出：当今曹操拥兵百万，又凭借皇帝的名义号令诸侯，眼下是不能与他较量的。孙权占据江东，已站稳了脚跟，只能联合而不能侵犯。他认为刘备可以夺取的战略据点，只有荆、益二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土”；而当时统治荆、益的刘表，刘璋却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因此，应当先占领荆、益二州，作为立足点。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北进中原，统一全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就是诸葛亮的整个战略计划。刘备听后十分赞成，拜诸葛亮为军师，此后十年中，他们一直沿着“隆中对”的既定方针接连取得胜利。

二、联吴抗曹的军事行动：

“联吴抗曹”是蜀汉的基本国策，抛弃这一国策，蜀汉的存在是困难的。赤壁之战，是诸葛亮实行“联吴抗曹”的一次尝试；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也表现了大智大勇，为抗击曹操立了丰功伟绩。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七月，曹操率近二十万军南下，企图统一全国。九月，曹

军占领了荆州北部的新野，刘琮不战而降。在曹操追击下，刘备退至夏口，以后又退至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曹操占领了江北军事重镇襄阳、江陵（今湖北江陵）及广大地区。得势的曹操，于江陵写信给孙权说：“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对孙权进行恫吓。孙权把信展示群臣，文武，“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文官建议迎降，只有少数武将文臣如周瑜、鲁肃等主张“同心一意，共治曹军”（《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而孙权还想“观望成败”犹豫不决。在这予决沉浮的关键时刻，诸葛亮说服刘备，照隆中决策亲赴紫桑（孙权驻地）与孙权结盟。

诸葛亮向孙权分析了战争的形势，很有信心地指出曹军南下的几大不利：“曹操之众，远来疲敝……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指孙权）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指刘备）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资治通鉴》卷65，献帝建安十三年条）孙权听后大喜，终于下定决心联刘抗曹。

赤壁鏖兵，孙刘联军共约五万，抗击了曹操二十万大军（号称80万）并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诸葛亮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诸葛亮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正确的判断呢？原因在于他在战乱生活中，熟悉各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形势，在许多矛盾存在的同时，能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诸葛亮深深知道曹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占着优势，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同时也看到曹操的强大，对孙权也同样是严重的威胁。于是他就利用曹操对刘备和孙权同样的矛盾，利用他们同站在受威胁的地位，而把后一个不利条件——次要敌人孙权，转化为与自己有利的同盟者，制定了他的“联吴抗曹”的决策。

执行这个决策，就是从赤壁战役的时候开始的。所以赤壁之战以后，就象诸葛亮所预见的那样：曹操兵败北上，暂时放弃了统一全国的企图；孙权在江东的地位转趋稳定；而刘备也能觅取机会进入益州。这样，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三、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

赤壁之战后，三国之间，特别是魏蜀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是为什么呢？三国之间魏国比较最强，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他对外扩张的物质条件。它想统一中国，就必须灭掉蜀、吴两国，但又无力同时进行。蜀、吴两国里，蜀稍弱，吴稍强。这样，蜀国便成为魏国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诸葛亮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为了争取主动，便抢先进攻魏国，这就是诸葛亮所称的“北伐”。为了争取吴国的支援或中立，诸葛亮即使在孙、刘敌对条件下，也用最大努力做矛盾的转化工作，把孙权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公元219年，蜀吴为争夺荆州，关羽被吴所杀，于是蜀、吴关系恶化。刘备为报杀羽之仇，双方发生过“夷陵之战”（湖北宜都），蜀军惨遭失败，刘备也由于白帝城病故。但做为政治家的诸葛亮，西对北西强大的曹魏政权，如何维持鼎立均势，是有见识的。如与孙吴结怨，势必让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当刘备死后第一年，诸葛亮立即派邓芝、宗子出使东吴，与孙权修好。宗子对孙权说：“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三国志·宗子传》注引《吴历》）。孙权深以为是。从此，蜀吴两国又结成盟友。而诸葛亮便可腾出手来专力对付曹魏。 综计诸葛亮自从公元228年

春，初次北伐，到公元234年秋，死于五丈原（今陕西郿县境），六、七年之间，与魏国共作战七次，其中六次是主动攻击。但是，诸葛亮毕竟不可能跨越当时客观条件所给予的局限性。他不仅没有具备获得胜利的物质基础，而且由于魏蜀之间的战争，只是两个不同的地主统治集团之间的互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参加，蜀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四、对待少数民族的政族。

诸葛亮在执政期间，为了贯彻“联吴抗曹”的既定国策，需要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在对待民族关系上，也尽量做一些转化工作，把反对自己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注意改善和加强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基本上实行了《隆中对》里提出的“南抚夷越”的方针。刘备入蜀后，先后派邓方、李恢等人到这些地区，整顿政治，改善关系（《三国志》《蜀志·李恢传》）。但是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对抗蜀汉政权，企图搞地方割据。公元223年，益州豪强雍闿和永昌人孟获相勾结，发动武装叛乱。在这以前他们杀了益州郡太守正昂，还把继任的太守张裔执送孙权（《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越嶲夷王高定，群舛太守朱褒也起兵响应雍闿。当时，刘备刚死，蜀汉政权内部还不稳定，诸葛亮没有急于出兵。他采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志》《蜀书·马良传》）的政策，先巩固内部，积聚力量，公元225年，诸葛亮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率兵向南中进兵。在南征中，诸葛亮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的方针，除了军事上的镇压，还展开政治攻势。孟获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诸葛亮对他“七擒七纵”，终于使他心服，表示不再反叛。亮任命他为御史中丞，管理当地政事。诸葛亮还重视当地的农业生产，鼓励山区游牧部落迁居平川，从事农业，并把汉族一些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矿业，提倡先进文化。由于诸葛亮的这些措施，西南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西南地区在这一时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的改善，还使蜀汉无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北伐曹魏。

五、诸葛亮治蜀政绩。

蜀汉在三国中地盘最小，人口最少，基本上只限于益州境内，全国人口94万，军队10万，那里虽有“天府之国”、“鱼米之乡”的美称，但与曹魏的广大北方相比，毕竟是财薄力弱。然而他能在大国的威胁下长期生存，并敢于对强魏采取攻势，除了他正确执行“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外，更与他治蜀的政绩分不开的。

诸葛亮在蜀国当政时，持法严谨，能团结内部，上下协调一致。也比较注意发展经济，力图造成稳定的封建秩序，缓和阶级矛盾。在频繁战争的空隙里，还“休士劝农。”在军事前线的涪滨，也实行过分兵屯田的办法，为了弥补因战争而增加的国家的开支，诸葛亮争取从蜀锦的对外贸易上来弥补财政的不足。据考古发掘，武汉和南方其他许多地点都有蜀国的铜钱和漆器、铜器出土，说明蜀、吴由于长期结盟，两国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往关系。他注意选拔贤才治理国家。如蒋琬、王平等入，其资历虽浅，但理政有绩或临危不乱，亮则按功论赏，破格加官，不徇私情。他在著名的《出师表》中就特别借鉴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